

LIANG YOU

良友

文匯出版社



一九三五年七月廿日
隨徐師訪南寧
自小學結交迄又時
十載以所新舊情
晤外尚有老友陳
君時兄三信師收
於懷懷友一教師

亲历

见证

发现

反思

修复记忆

书写个人史

为历史存真

第12辑



第 12 卷

主 编 桂国强 蔡晓滨
执行主编 臧杰 冷艳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友. 12辑 / 良友书坊编.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96-0132-5

I. ①良… II. ①良…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0374号

主 编：桂国强 蔡晓滨

执行主编：臧 杰 冷 艳

责任编辑：何 璟

装帧设计：良友创库·冯琳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照 排：良友创库

印刷装订：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85×232 1/16

字 数：250千

插 页：16

印 张：16

书 号：ISBN 978-7-5496-0132-5

定 价：35.00 元



命运断想·黄宗英·001

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答：难为赵丹妻。

又问：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出？答：是他的死。

我和杭州国立艺专·麦放明·026

林风眠校长身材不高鼻子特大，典型中国人的白净肤色。因他时时伤风，故好揣一方大白手绢擤鼻子用。无论阴晴，他都身着米色风衣。先生话不多声音很小，脸上永远带着和蔼的微笑。



《无冕皇帝》激起的风波·陈为人·031

我与从维熙谈到王蒙，我说：“我知道你与王蒙关系很好，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唐达成鸣不平。”我讲了一些王蒙对唐达成的冷漠。

吴奔星1950年代日记·吴奔星·055

今天在廖子山上全乡阶级站队，到群众约两千人，站成口字形，地主面向群众跪着，富农靠贫农中农坐着。会后有英山小学腰鼓及陈木匠湾妇女的秧歌表演。

地下文学现场中的“诗魂”·李亚东·092

从1970年1月12日到6月13日，二十五岁的青年蔡楚仅个人“交代”，就写了三十九篇。能够落实的罪状，也就“写反动诗”、“偷听敌台”两项，主要是前者。

成
长

一个“逍遥派”的风雨兼程·杨闻宇·104

“文革”之先，我因为假日回家与村里的社教工作队理论过几句，工作队给西北大学写了公函，认为我阶级立场大有问题，系里党支部对我施加过几次压力，让我检讨。

1960年代北大历史系师长速写·欧阳文·112

我们的清史课是在1966年春到昌平北太平庄分校半工半读时，由张寄谦老师讲授的。那时候，教学已很不正规，没有教室，就在简陋的宿舍里。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李文熹·132

1957年4月7日上午，我父亲被武汉市公安局花楼街派出所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从家里五花大绑押走了。那天是星期天，我不记得怎么得到一张《铁道游击队》的早场电影票，看完电影回到家时大约中午11点钟。

趣
味

《挪威的森林》“生日”纪事·林少华·146

就翻译住处环境来说，和村上春树写《挪威的森林》时住的低档旅馆多少有些相似。只是，我放的音乐，一不是爵士乐《挪威的森林》，二不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说来难以置信，我放的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和《平沙落雁》。

冷摊夺魂记·柯卫东·151

有一天晚上朋友来电话说，上星期四有书友在报国寺买到二三十张俞平伯手写的明信片，据说卖主是专卖邮品的，这些明信片他都是当普通实寄片卖掉了。

风
尘

父亲王林在国立青岛大学·王端阳·158

这年冬季，宿舍里又搬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公子哥”，他就是黄敬，当时的名字叫俞启威。他父亲是陇海铁路局局长，叔叔俞大维更是国民党的重要将领，但是谈问题很左倾。

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日记·郭根·167

日本攻打锦州与天津被扰的消息传来后，本校也稍微受到一点震撼，同学纷纷议论要罢课，要加紧军训，要赴京请愿。这样终于开大会了，会场上形成两个阶级，一方是教职员，一方是学生，教职员不主张请愿，学生是非去不可，于是决裂了。

活
法

换一种活法·贺爱莉·178

50岁的年龄再学一门语言真是太困难了，我想“朽木不可雕”一词此时用在我身上正合适，心里面全是沮丧，我觉得对不起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出国之前我只会生硬地说三个英文短句：good morning, excuse me, thank you.

我的了不起的人生·于洋·194

后来长大了，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富人，李嘉诚、王永庆之类的，读书的时候就去倒服装、摆地摊，毕业后卖烤肉、做传销……最后把我爹妈攒了半辈子的钱折腾了精光才明白自己压根就不是块经商的料。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名人的梦想。



外公的琴声·晨枫·202

外公跟着二哥学摄影，这时也加入了《良友画报》。二哥虽然身为总编，但在文化事业和商业诱惑之间游移，外公实际负起了编辑责任。在孤岛时期，《良友画报》的形式新颖、嗅觉敏锐、情趣时尚，成为在抗战中煎熬的上海人的重要精神食粮，外公则是这份大餐的大厨。

1985年马国亮赵家璧的26通信·212

你问我谁想约我恢复《良友》画报，这是你弄错了。去年秋天有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位老革命干部（王鲁彦夫人）坐了汽车，带了两个中青年，来舍约我挂帅恢复良友图书公司，说经费有、班底也有。你知道我怎么会上这个当。



特辑：风华

1942年2月1日，三十一岁的张沅吉和二十三岁的翁香光在上海国际饭店二楼举行婚礼，证婚人赵叔孺，男方介绍人张聿光，女方介绍人钱瘦铁，主婚人是新人的父亲张锡和与翁瑞午。

良友稿约·54



...



命运断想

黄宗英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急性子是一味中药，状似大南瓜子，手一碰，籽就蹦出来了。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

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偎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

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用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我当主妇伺候他。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二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邻居是赵琪副市长，他把他家的几十盆菊花寄放在我们院里，花开得灿烂一片。里院是住宅：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份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

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祖母死时八十一岁，是喜丧。我是穿着大红绒衣回去的。瑞安家里搭了竹天棚，摆了六七桌酒席，请戏班子来唱戏。我们在灵堂前穿毛边孝服跪着，来奔丧的客人，也要跪着哭丧。刚哭过站起来，就将手绢往胳膊窝里一掖，去正房打麻将了。正房里有两张麻将桌，女眷们都在正房嬉戏，吃莲子红枣羹。待出殡时，要有五对金童玉女盛装骑马走在送丧的队伍里。宗洛被选上了，他长得俊，脸上有一对酒窝，不笑时是两个小包。我太难看了，当然选不上。我很羡慕骑马的金童玉女。出殡后，竹棚要拆了，天井显得很大。我们就和堂兄堂姐在天井里跳房子、打架玩。我最喜欢堂姐宗敏。她长得特别好看，梳童花发，穿淡蓝色单襟上衣、黑裙、白袜黑鞋。我喜欢对着她看。回老家奔丧我们是从青岛乘海轮去温州，然后再乘江轮去瑞安。我和宗洛第一次坐船，特高兴；上上下下在各层甲板上窜，趴在船长室门外，观看船长把着轮盘左转右转；看宽大的餐所厅，厅前支有打克楞球的架子，还有卖水果的摊头。买了些瓯柑，瓯柑皮厚味苦，能清火补心，我很爱吃。我们坐的是二等舱，舱内有一张双层床，一张大长沙发。船过一江山岛时哆哆嗦嗦，不是浪是涛。我和大弟都晕船

了。母亲不晕船，就为我们剥了瓯柑，服侍我俩爬到上层床上躺下，动也不敢动。母亲说：“半夜可能要查夜，只要用温州话说一句‘瑞安黄宅’就不查了。”果然半夜来查夜的人，听母亲说话后就不进舱了。到我长大，才知道自己是官宦人家出身。

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朋友打电话来说：“麻将牌已糊好了。”母亲说：“你自己用吧。”没两天，我看到父亲的灵前，有用纸糊好的楼房、汽车，以及佣人张三、李四、秦妈。父亲的棺材，用麻绳

一遍遍捆好，由四叔运往瑞安祖茔安葬。上船时，还捉一只大公鸡站在棺材前。

父亲是四十八岁死的。青岛电话局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是五十岁死，就有抚恤金。他晚死两年就好了。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三百六十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亲靠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林表伯在天津，世交陈表伯在天津兴业银行任副经理。我们在天津近郊土山公园附近树德里，租了个三小合院，只北屋三小间，东西屋各两小间。林表伯的姨太太住西间，东间是厨房。冬天要生炉子，只有堂屋有个大炉子，把烟筒直通里屋。一天林太太早上起来，看北屋不像往常，竟没有动静。她走近北屋，闻到一股煤气味，忙喊来邻居，撬开北屋门，把我们一家人抱到天井地上，一家子都中煤气了。我倚在台阶上，吃着谁让我吃的青辣萝卜，自此我一辈子都怕煤气味儿。

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璨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

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粘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家境贫寒，我和宗洛都惦着长大去卖菜、卖硬面饽饽……从没做过想当演员当作家的梦。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落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因为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觉得那地下甬道很长很长，自己的钥匙要与银行的钥匙对上，才能开锁取出保险箱。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

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我只想自己能快有工作就好了。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二十元钱。母亲也凑了二十元给我，生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我到此方知亭子间并不真的是亭子，而是夹在一楼和二楼的朝北的小间；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里面有大哥的一张铁床，一张两屉的书桌，一把椅子。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大哥教我怎样拿小竹筹子，到对面街上老虎灶去打开水。两人吃了点面包，就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大哥找出《剧场艺术》等杂志给我看，他说如果楼下有人喊王中刚，就告诉他我去剧场了。我吃了他为我买来的大饼油条当早点，就埋头看起书来，忽听楼下有人大喊王中刚，我忙跑下楼去问他：“你找我哥吗？”那人却问：“要几块？”



我看他拎着篮子掀开棉布罩，原来是卖黄松糕的。我又没带钱，只好讪讪上楼去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嗨，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吴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

还买了一只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十六元月薪，若干张澡票，说是黄导吩咐的，大概是怕我没钱吃饭吧。如此，一天有五角钱饭钱。大饼三分钱一只，在后台吃葱花炒饭两角钱，摊头上，一碗馄饨两角五分，下午买面包七折，傍晚买半价。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轰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嚅嚅地说：“戏好。”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

十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在拉紧大幕点着工作灯的舞台上，给我排了排位置，就让我上台。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在后台有大人往我背后一推，我上了台就偎在秋瑾的怀里，秋瑾按我一下，我就说一句台词，按了六下，我说了六句台词，又跳绳下台了。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地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饭早已凉了，我囫囵吞下。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一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房东陈家姆妈是个寡妇，有一个女儿，待我们极好。一天，给我们端来五碗排骨面，说是小女生日。我们也无法回礼。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十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其他空的地方，就是剧团管道具的周阿炳的周转地。所以我们的两间屋，有时很豪华，有时很寒酸。只一架钢琴不动，琴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总谱。我是第一次看到交响乐的总谱，那么复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

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我去向著名的声乐老师姚继新学声乐。我不是去学唱歌，而是去学发声，希望学到高声不出尖音，低声能送得远。姚老师用钢琴伴奏我练声，很有效果。我在台上可以像平常说话般，声音就送得很远很清楚。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黄导一天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低音大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默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兄妹就搬进卫乐园一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搭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居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是我国戏剧界学术最高的专家。他们都用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丹尼在《自然之子》和伯来西特的《胆大妈妈》中，演得都很棒。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

《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斯多德、伯来西特……不担心没书看。

一天晚上十点来钟，我们饿了，ABC宝石饼干也吃光了，就去过道的黄导家冰箱里“偷”面包和火腿吃。吃饱刚睡下，忽然宗江问：“冰箱的灯关了没有？”我答：“我没关。”石挥说：“看看去吧。”他俩披衣穿着短裤去开冰箱门，我也披衣去了，只是怎么弄，冰箱的灯总关不掉，只好担心地睡下，害怕冰箱会爆炸，还好一夜无事。早上早餐，依然有面包、火腿和冰硬的黄油，我们才放心了。此时，我们三人都是名演员了，街头海报上的名字有冰箱那么大，却都不认识冰箱。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政客川喜多长政控制了上海电影界，建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幸亏金星电影公司经理周剑云卖了个交情，没把我们二十多人的名单往上送。那时我们剧团的头面人物，刚被周剑云网罗不久，签了长期合同。记得合同上还有五年内不许结婚条款。当时，让我饰演一名被强盗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灯节时出来看灯，被强盗看中。要拍一个长长的美少女特写，我在蓝兰大姐的介绍下，把一颗小虎牙换掉了。全片只两个女演员，另一个是强盗婆，由端木兰心饰。戏还没拍，上海就沦陷了。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和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

《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要得开为赞。

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佣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不过，我们两个剧团的上座都不怎么好。因为夜里交通管制。这时，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儿子黄伟喜欢上话剧，串联两个剧团合作，组成荣伟剧团，规模宏大，角色整齐，日夜两场，演出轰动，掀起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甜姐儿》是由法国剧本《巧克力姑娘》改编，是一出讽刺轻喜剧，写一官僚家的千金小姐孙小玉，赴郊外骑马，晚上开车回家，汽车坏了，小姐闯进小职员林君植家。孙小玉穿着大红上衣、白马裤、黑马靴，戴黑丝绒马帽，执马鞭上场。她指手画脚，林君植的房客Mr刘马上溜须拍马，林君植则不买账，拼命谴责

阔小姐。小姐一生没受过人的谴责，反而感到新鲜高兴，并爱上了林君植，闹了不少笑话。观众很爱看。我每上场都换一套衣裳，尤其第三场，我穿一件毛线织的长旗袍，同色长外衣，是从来没人穿过的式样，是剧团的参谋宋淇（戏剧家宋春舫之子）的女友邝安美新开的毛衣店为我特织的。此戏上演时，有富裕人家的小姐太太，坐汽车带裁缝来看我的服装。宋淇认为我平常也应穿得讲究些，就带我去他姐家。他姐把漂亮衣服摊了一床，任我选。我只挑了两件打网球时穿的短袖白衬衣。我对宋淇说：“这些衣服都太漂亮了，我不习惯穿，也没场合穿。我觉得一个演员，在台下太闪光了，在台上就闪光不起来了。”我一辈子在台下，都是普普通通的。

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我有些害怕。但我的戏还是越演越成熟，可也闹了些笑话：在演话剧《家》时，我演梅，宗江演觉新。在花园里，演两人走向台右，觉新抒情地说：“还是这片青草地，小时候，我们……”本该说我们在这儿打青草滚，捉蝴蝶，可突然功德林面馆的伙计，从舞台月亮门里提着椭圆的大饭笼走上台来，他尴尬地不知怎么往前走。宗江笑场了，五官都往上翘了起来。我正面对观众，只得把袖子捂着脸装哭。台下也发现了，鼓倒掌了，舞台总监胡导只好放下大幕，把伙计引向后台，还谴责了宗江和

我，大幕再升起时，我们重新缓缓走向台右……

演《上海屋檐下》时，舞台上搭起二层楼的横剖面。我演舞女。幕启时，我睡在前楼的床上。别的人在楼下演戏，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监督用长竹竿把我捅醒，才赶忙装作打了个打哈欠，起床演戏……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双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他说：“俗称菌性心脏病，千万不能动，复发时有生命危险，不要动，不要下楼。”我装成泰然，返回亭子间，告诉郭元同：“不要紧，只要

吃下药，不要动，会慢慢好的。”我勉强元同服下药，又拿一只脚盆为他接下小便，陪他坐了一会儿，又帮他脱了衣服，盖好被子，为他按摩着，直到他睡去。我关照丁力、德伦晚上醒着点，如果元同出汗了，不要让他着凉。

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在我和沙俐、蒋天流

轮换演女主角的空档里，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盖满了兔棚，养了八十多只长毛兔。北屋正房是一大间，有一张大炕，旁边有一小间，是元同弟弟住，也给元同留了张小床。晚上，我和伯母还有保姆老郑一起睡在大炕上，是热炕，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前年在香港去世。基督教把人的死，视为去上天做上帝的新娘了。）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我见房内有缝纫机，又踏了贴玻璃的白纱布窗帘和厚的细格布窗帘。我要把几年来没敢拥抱元同的思念，统统给他，拥抱个够。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

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就勉强扶他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躺在为病人查体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我只听到元同的喉咙里“咯”的一声，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待医生护士进来，才发现元同已经停止了呼吸。打强心针、做心脏按摩……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说：“他被痰卡住了。”没人理我。医生用床单罩住了他的脸……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甬道特别特别地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岁成了寡妇。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元同的棺材往山上送，是雇的八人抬杠。抬经我们的新房门口停了下来。

